



# 新大陆国家形成的生态学基础： 一般和局部模型的构建<sup>\*</sup>

◆ (美) 马克·科恩 (M.N. Cohen) 著

◆ 陈洪波 译

(复旦大学文博系)

◆ 陈 淳 校

关于一般进化论和历史特殊论这两种文化演变阐释模式的相对优缺点,在人类学中一直争论不休。近来对原始国家起源的一些解释方法就反映了这种争论。有些学者寻找各类早期国家形成的重大共性,而另一些学者在描述和分析各个国家形成过程的时候,则否认共性的存在,或者认为只是在很抽象的层次上才具有共性。

这两种方式都具有一定价值,一个好的文化历史学阐释应是二者适当结合。但我相信,在关于国家起源的问题上,两者存在应用不当的情况。一方面,寻找共性并没有找对地方,并且也许对共性的估计超过了实际情况;另一方面,特殊论信奉者以一些不当的理由草率地否定一般论观点。两派都未能全面把握问题的基本特征。我认为,我们必须调整我们的关注点,以便确定一般论和特殊论的适用领域和贡献。

简要回顾一下一些较一般性的现代国家形成理论——以及对这些理论的反应——将有助于我们的讨论。卡尔·威特福格尔的意见可能是现代国家形成理论的雏型,他提出,灌溉(以及因灌溉刺激产生的管理阶层)在专制政府的最初演化中发挥了作用。在提出这个理论的时候,威特福格尔实际上

是假设了在通向国家的演化过程中,部分社会存在共同的环境诱因和类似的制度反应。近二十年来所提出的很多其它假设,也都提到大量其它环境特征或者各类事件或机构在国家形成过程中的类似作用,例如战争(防御或征服)、人口增长、等级差异、贸易及互惠关系、区域环境的异质性等。其中最受重视、讨论最热烈的一般性理论就是罗伯特·卡内罗的学说,认为“限制”区域内的人口增长和战争是早期国家的共同特征,这将它们的历史与那些并未形成国家的地区有所不同。

这些一般性理论引发了相当大的争论和研究,但另一方面作为阐释多少并不成功,这是因为区域性研究没有能够(1)证实存在国家形成地区存在设想的因素;(2)表明在其它地区不存在这种因素;(3)确认它在演化过程中应有的作用。因此,近来对国家起源研究的综述,一般来说难以有力支持威特福格尔或者卡内罗的观点,或者找到关于早期国家形成环境或历史的其它具体类似假设。这种失败使得特殊论学者竭力排斥通则性理论。最近很多研究都表现出对进程的怀疑,并在个别序列的描述中对历史相对论表现出更大的容忍,而仅在分析的抽象层面才承认相似性。与新方法较强的相对论相

<sup>\*</sup> M.N. Cohen, The ecological basis of New World state formation: general and local model building. In: G.D. Jones and R.K. Kautz (eds), The Transition to Statehood in the New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105-122.

伴的是一种摒弃“简单”或“单因”(monocausal)的演变理论趋势,而代之以对复杂社会系统中多种因素、人物或群体之间互动更大的偏爱。

例如,弗兰纳利就令人信服地提出,整合早期国家历史进程的规律性应该从促使社会系统发展的普遍过程和动力中寻找,而不应该从环境、生态(狭义)或历史的共同特征中寻找。他主张环境特征只是有助于引发和选择社会系统变化的刺激因素,在每个个案中这些刺激因素都是各不相同的,系统之间的相似性只存在于抽象定义的对外界共同反应的普遍性质上。

同样,怀特和约翰逊主张,国家的演化代表了信息处理系统的发展,是对提高信息处理能力要求的反应,而这种要求可能是各种情况合力的结果。罗纳·科恩曾经提出,国家代表了社会系统对一系列环境刺激反应的趋同演化,是一种由系统本身性质所构建的趋同。以一种稍有不同的方针以回应通则模式和对系统论的使用过头,赫伯特·莱维斯建议从特定社会内部个人和利益群体事件和行为的轨迹来重新考察国家形成的过程。因此,近来各种论著看来反映了对比较特殊、局部研究方向的回归。

#### 有限通则作为二重分析组成部分的需要

如果说现有通则被证明限制太大而未能被确认,那么反对意见朝相对论走得太远,因为它没有考虑问题的本质:各早期国家演化所见的同时性。查尔斯·里德(C. Reed)曾经指出,描述农业起源的问题并不只是解释它为什么发生,而在于解释为什么在很短时间里世界许多地方都发生了农业起源。这里的问题也一样:不只是“国家为何产生?”,而是要问,“国家(或者更恰当地说,包括酋邦在内的所有制度性集权政府的形式)为什么会在短时期内在世界各地发展起来?”事实上,正如我在探讨农业革命时所指出的,并作为对里德询问的回应:广泛选择一种新适应模式的普遍现象,而非特定个案中演化路径的特殊性,是有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也是最适于系统分析的问题。

很明显,以这样的方式来谈问题,不管我们的关注如何具体,想像的系统如何复杂,我们必须在各种演化史中寻找至少一个共同的选择因素。除非我们承认存在这样一个共同因素,否则我们被迫接受这样的看法,即许多独立发展的社会系统同时向

国家发展(一般指集权政府),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偶然。但这种巧合实在不可思议。

而且,尽管弗兰纳利有如是看法,但共同因素很可能是每个演化系统外在的东西(例如最广泛意义上世界环境的共性)。否则,我们只能认为政治集中是社会系统演化固有的一部分,各系统演化的步调与其他系统一样是内部调节的。这种共同因素一定是相当“简单”,尽管系统论者否认这一点。它不太会像系统论者试图提出的是事件或状况相互连接的类型,而很可能是高度个性化的。

如果我们设想一个特定社会系统是以多元的输入和反馈运转(或者以莱维斯的说法,把它设想是个人与利益群体的复合体),并能够分辨系统偏离一种相对稳定状态而进入一个转变期时,那么我们最好试图去分辨一种或更多的新的或不同的因素或条件,是它们改变了系统的状况,或打破了竞争成分或群体之间的力量平衡。(于是,分辨一种特定状况作为触发或选择系统状态变化的条件,既不与“系统”观念相左,也不否定复杂性。)

举一个具体的相关例子。设想一个社会是一个各种力量的复杂混合体,这些力量既包括倾向于引发进一步政治集中的力量,如充满领袖欲首领的野心和魅力、合作或防御的需要、相互依赖的经济保障,也包括抵制集中的因素,如激烈的竞争、平等主义或个人主义的道德规范、以群体分散和移动来缓解社会或经济压力的传统等等。如果混有这些对抗压力的社会开始以一种大致散中心的状态下存在了很长时间,没有正式的首领和边界,或明确的成员,而后开始形成一个极权政府,我们有理由去寻找一个或更多的转变条件,是它们打破了平衡,或“选择”了新的发展方向。这样一种转变条件并非是一种神秘的“原动力”,而可能是单一的、相对简单的条件变化,不管我们设想社会系统是多么复杂。

更重要的是,假设存在几个独立运转的这类系统,但都倾向于各自保持散中心状态。我们假设同时或大约同时,它们中有很多开始转向较正规的集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来应该或必须去寻找某些共同因素,是它们的改变打破了各系统的平衡。如前文所述,如果我们不去寻找这样一个共同因素,就意味着只能相信这是一种极端的巧合。

而这正是考古记录显示的情形。在大约 6000

年前,当时人类系统几乎普遍是散中心的(“平等”的游群或结构松散的“部落”)。之后不久,较集中的社会开始在很多地区独立出现。即使我们考虑到社会间会相互影响,所以并非所有(甚至大多数)系统都是独立产生的这样一个事实,但巧合的程度也是惊人的。学者们经常讨论的国家形成的六个主要地区,虽然很大程度上是各自独立发展的,但是发生的时间惊人地相近(与现代人考古记录的长度相比)。关于各个案例演化的独立性还有一些争议,学者们对“原始”国家数量的多少看法不一,但是据我所知,目前的争论中还没有哪一个认为早期国家的分布可以完全或主要以传播来解释。

如果你不仅观察原始国家的分布,而且也观察一下酋邦或者一般政治上集中社会的分布,这种巧合更为惊人,它们在世界上的分布都出现在很短的相同时间段之内。我十分赞同塞维斯的看法,他强调酋邦的演化在政治演化中是一个意义重大的事件。无论你是否同意他的假设,把酋邦当作是国家形成的一步,还是接受他人的观点,认为酋邦代表了独立演化的结果,就目前来说都无关紧要。正规集中政治机构的同步演化才是首要问题。我觉得,我们的主要任务应该定义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在如此广大的地理范围内导致这些机构出现的一般性条件。一旦涉及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尝试解释特定原始国家的具体演化,去观察它们是否具有相似的演化轨迹,并将它们作为一个类别与酋邦的演化轨迹区分开来。

所以应该注意的是,寻找对其它不同和独立系统演化起作用的一种共同因素,与设想它们具有一条共同的演化轨迹完全不同。这种查询仅是设想不同轨迹在某些选择下沿着一个共同方向发展。例如,如果我们接受弗兰纳利把环境事件看作是对社会系统随机发生作用力的概念,那么共同因素只需是某些能够增加不同系统的敏感度、并使其对各种作用力都产生类似反应的共同条件就够了。因此,分辨这样一种共同选择因素,不一定与其它个别文化序列高度特殊化解释相矛盾。毕竟,现代生物进化论和以类似术语对文化演化所进行的非常成功的阐释,都认为演化的创造过程是高度个性化的;而次序只不过是自然选择隧道效应(channeling effects)附加施于的。

我提出的对国家起源的二重分析法,与过去戴

维·哈里斯和我分别独立提出的对农业起源的分析方法类似。我认为,如此众多的食物经济在走向农业的演化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相似性,要求我们应该承认所有这些系统中运转的共同选择压力,而各种系统中的这个共同因素就是人口压力。哈里斯以人口压力为起点,但是他认识到人口压力是在多种文化和生态背景下发挥作用,所以他主张不同文化以不同的方式或沿“不同路径”来应对它们的共同问题。有些文化发展出成熟的资源驯化,而另外一些却没有,这就是条件相同、但却往往是历史特殊性组合的结果。总而言之,人类社会有着共同的需要,从有限的空间中获得更多的产量。但是,由于环境或文化变量的局部特点,这一共同刺激因素引起了各种不同的反应,其中一些共同沿着我们今天所说的“农业”发展。我认为,本文的任务首先是定义那些刺激政治集中社会平行演化的共同问题,然后探索“不同途径”,以确定是否有可作进一步的解释各种途径,或者它们本身也像通向农业的那些途径一样是个性化的。

#### 解释政治集中一般刺激因素的假说

我认为,集中的共同刺激是地球上可用环境中狩猎采集者的饱和。而且,世界上许多地方的社会文化系统都是因为它们生态的相似变化,从一种离心政治趋势占主导的状态向一种向心集中趋势占主导的状态转变——当狩猎采集群占据了所有生存空间的时候,这种转变就会出现,也就是从一种狩猎采集者灵活、扩散、和不饱和的生态转向一种局部的适应。

在其他地方我曾经提到,由于人口对野生资源的压力以及狩猎采集环境的饱和,使得农业在世界范围内开始出现,或者说刺激了农业的产生。而且,对旧大陆和新大陆考古序列的考察也表明,广泛采纳农业是在人口扩张占据全球之后,同时扩散到新的生物群落中和渗入先前不曾利用的小生境中,同时广泛开发各种辅助食品。我在这里提出,集权政府的兴起也是相同过程的一个间接结果。

简言之,解释农业的观点是这样的:在更新世中期人口密度相对较低的情况之下,以相对较低的劳力支出就可以获得营养丰富的可靠食物供应,这时狩猎采集者对他们食物经济享有相当大的选择范围。整个旧大陆的这种人口,显示一种普遍相似的维生经济,比较注重猎取大型动物,并集中在大



动物比较丰富的环境中(主要是开阔草地、热带草原和开阔的林地)。大多数人口会选择最佳的经济方式,通过群体的随机流动——或是个人流动、或是大家一起周期性地变换营地,以减少周期性短缺。群体增长超越这种策略的微弱趋势会因人群之间存在开阔地带和未利用空间,而被群体分裂的简单机制所吸收。而后,这些群体扩散到全世界,包括旧大陆新纬度地区及新大陆,同时还渗透到原来所在纬度许多次等或次优环境中(如茂密的林地)。

随着人口的进一步增长,人口压力为外迁所吸收的可能性降低,以流动来维持原有生活水平的可能性也减小了。其它人群逐步占据边界地带,甚至还侵入群体的日常活动范围。同时,某些资源变得越来越少,因为退化(受到过度开采或者环境破坏)或有更多的人口需要供养,从而难以维持人类的生存。结果,人类的反应就是开始开拓各种次级资源,如水生食物和淀粉类植物,这些东西不受青睐,但是能够满足人们的不时之需,或者因为其高产令人重视。由于偏爱的食物变得不足以提供季节性的营养,对这些产卡路里食物的消费就超出其先前的供应季节,这导致试图对储藏食物的选择偏重于其季节性的丰产和可储藏性而非它们的口味。对这种储存的严重依赖,加上人类在食物生产上的增加投入,以及其它人群的日益进逼,最终迫使人们定居在最高产和最容易储存的食物资源周围。

显然,这个过程无处不在。在全新世纪的几千年中,分散在世界各地以开拓各种食物资源(野生的和栽培的)的大量人口开始定居下来,而他们的祖先在几千年前并不利用这些资源。

这种人类经济的扩张模式是高度概括性的,既因为它试图寻找不同地区适应趋势的广泛共性,而局部的多样性,又因为由于相同的生态以及开放的社会系统减少了文化变异,这使得对中石器时代之前的狩猎采集者要比现代的同类人群更容易进行通则性的描述。这一模式被认为无法验证而遭到某些批评家的排斥,也就是无法通过寻求新的发掘策略来从整体上加以检验。但是,各个部分和假设可以通过我们对人类习惯和经济的一般性知识进行正式或非正式的检验,——例如与非西方人群的劳力支出、技术能力和食物偏好作比较。就最省力原则而言,它是迄今为止对农业起源地理传播(可根据现代民族学观察来解释)之前史前阶段事件总体

发展最简明的解释。而且,它还具有解释后来集权政府广泛出现的功效。

一旦人类社会被迫——主要是受人口压力——采用一种定居的适应方式,各种有利于政治集中(有时就是国家的形成)的条件就会出现,这意味着人口的进一步增长和人口压力的继续积累。重要的是,新适应的各个方面明显趋于既加速人口增长,又刺激人口聚集而达到一种人为的高密度。伴随着定居农业发生的食谱和育儿实践的转变,被认为刺激了新石器时代的出生率。而且,许多劳动者改为从事边缘性工作,很可能鼓励偏好大家庭的文化选择,尽管局部群体可能采用多种新策略而非靠生育来增加新成员。R. 科恩提到,定居产生的很多策略,如收养、陪嫁、一夫多妻、寄养甚至是掳掠,都导致了栖居的集中和人为的局部高密度人口。

但重要的是,集权政府的演化很可能是以新适应问题激发的一系列过程的结果——这个过程并不意味着持续的人口增长或压力,而不同地点情况可能也并不相同。而且一旦启动,这些过程很可能像弗兰纳利或者科恩所设想的那样,从社会或政治系统获得它们的形式和能量。不管怎样,饱和概念的吸引力在于它触发了一系列新的适应性挑战,它与不少学者曾经予以考虑的、造就政治集中和国家形成的诸多条件相似。实际上,所说的这类饱和无疑是绝大多数其它国家起源理论的前提条件。

最根本的一点是,环境和社会“限制”的某种合力,很可能成为许多(如不是大部)人群处环境的重要部分,所以卡内罗假设的那种结果是相当普遍的。人群现在难以逃逸以消解来自毗邻人群的政治压力,因为附近的空间几乎已经完全被占据,而且,依赖储存资源或者在耕地上大量投入的定居人群,易于接受征服而不愿承受军事打击。另外,原先靠群体流动来解决的各群体之间生产潜力或特殊资源的不平衡,现在很可能成为冲突的原因。

各人群对这部分弱点的认识也许有助于在两种力量的平衡之间摆动,一种力量倾向于产生“头人”的霸权或延长首领的任期,而另一种力量则倾向于削弱他们的权力。于是,征服以及威胁都易增强和提供导致国家形成的条件。

所述的饱和形态可能以另一种方式造成战争和征服的危险(间接促成国家的形成)。一旦定居人口的栖居形态成型,就会创造出一种新的生

境——游牧人群所依赖的有序利用的资源,它们曾经为流动狩猎采集者利用,但是对于定居群体就完全不适用了。这类游牧群体的军事潜力广为人知,尽管他们在早期原始国家形成中的实际作用一直受到质疑。

同样,随着定居很可能会出现一种新的社会弱点。因为拥挤和投资,人们不会从争斗中离开。这种内部冲突很可能有助于产生集中权威的司法作用。内部冲突也会随人口进一步增长而加剧,由于无法通过移民减压,随着社会冲突加剧,必然导致土地竞争的加剧、对所有权更正式的确认、以及资源获取的不平等。这种冲突反过来会有助于集权政府的产生。

最后,这种限制能够促使群体在合作工程如灌溉上的投入,其目的或是为了吸收限制区域内进一步增加的人口,或是为了缓解当地资源面临气候波动的压力,这种波动对于规模大、流动性低的人口危险性很大。

这些描述的情况可以代表了刺激集权政府产生的“另类途径”,一旦饱和发生或它代表了某特定地区对过程产生作用的不同因素的组合。

但是我觉得,世界各地复杂社会演化最常见的适应问题是经济缓冲功能的丧失,原来的生态平衡系统丧失,狩猎采集者被迫采用定居方式。像当代很多学者的看法一样,我认为集权政府的一个主要共同特点,以及它们被选择的主要角色,就是缓冲人群所面临的生态灾难——在定居所需的可用空间饱和时,取代业已丧失的自然缓冲功能。我在其它地方曾经提出,最初定居的中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或相应的新大陆古代期文化),代表了人口平衡两种不同策略的分水岭。第一种策略或狩猎采集者策略,社会比较简单,但只存在于饱和发生之前,是通过调整人群的布居以适应资源的分布。第二种策略,社会性远为复杂,似乎最有效的就是由政府来执行,通过按人口的分布来分配资源。

从考察狩猎采集人群趋于定居和采纳农业策略时的生态环境,我们可以察觉人类自身缓冲能力的衰退,这种衰退既有环境本身风险因素的增加,也有应对风险社会机制的逐渐丧失。我的观点与人类学采纳的、由哈德斯蒂充分阐述的“生境宽度”(niche breadth)概念有类似之处。生境宽度基本上是用来衡量人口利用资源或者生活条件复杂性的

尺度。一个宽生境提供一批不同的资源,具有很好的缓冲功能,因为人们可以在各种可获资源之间转换,以应付波动,这在一个不稳定的环境中是最理想的。但是,密集的人口和日趋激烈的竞争,倾向于在竞争人群中产生不同和特化的适应(如竞争导致较窄的生境),如哈德斯蒂所言,这种情况一直与人类史前期人口的增长相伴。

对于某时某地的一些人群来说,较宽泛的口味和觅食策略,可能有助于暂时降低环境风险。但是如我所言,如果人们只是在偏爱的资源耗尽或者是变得匮乏或不可靠时才增加新资源的话,那么日常食物种类范围的增加确实说明了这个事实:人们开始利用或者依赖那些过去只是应急的东西作为主食。在这一增加过程的早期,风险因素是增长还是降低,尚有待于讨论。明显的是,到增加过程的晚期,当狩猎采集策略接近饱和点,每个人群可用生境的实际宽度显著降低。每个人群只能开拓一个较小的地理范围,很多人群很可能只占有“边缘性”区域,高密度的人口很可能意味着可作主食的资源屈指可数。这种高密度和狭窄的地理范围,意味着资源随时间波动及空间的不均匀分布使风险增大。正如桑德斯和韦伯斯特所说,在一个风险相对较小的环境中,人口的增长会因为对边缘性和低档次资源的加大依赖,以及个人和群体占地面积的减少而产生风险。

这个问题会因采纳农业而更加严重,我觉得这是人类应对在有限空间里强化卡路里生产需要的必然反应。农耕在卡路里上高产,但生境相当狭窄。农业系统是一种设计来通过种植少量物种以转化为最大能量的系统,很像生态演替的初期阶段,出现了一批并不稳定的生物群落,无法很好缓冲环境的波动。而且,如果(情况常确实如此)农业主食是外部输入而非对当地物种的选择,这使风险因素更大。如果以为脆弱性只是农业的特点,那是错误的。前面的讨论表明,正是很高的人口密度以及地理限制主要造成了这一问题。只不过农业加剧了这个问题。值得指出的是,在人口稠密和较定居的狩猎采集者如加利福尼亚和太平洋西北海岸的印第安人中,也形成了缓冲系统来应付阶段性关键食物的短缺问题,暗示集中权力的肇始。因此,在这类群体和农业人群中存在的社会政治现象的相似性,可能反映了它们对资源波动具有同样的弱点。

这种日益强化的生态脆弱性,很可能随着低密度条件下狩猎采集者可行适应机制的部分丧失,也即因自然流动性和社会流动性的丧失而加剧。资源竞争和对局部资源投入的加大,很可能意味着越发不能容忍外来者利用这些资源,这就强化了局部群体所有权的形成,如不是私有权的话。另外,投入和竞争的加大,以及合作工程的需要,都趋向于增强人口的向心凝聚力和群体身份的正规化,于是削弱或消灭了狩猎采集者用来根据资源调节人口密度的简单群体流动机制(随意的群体分裂和聚合)。而且,随着人口密度增加和定居的出现,曾经是狩猎采集经济一种主要缓冲机制的互惠交换社会网络,就会在规模上或至少在地理范围内开始走向衰落。

在环境风险增长和传统缓冲方式削弱的共同作用下,很可能提供了一种有利于建立动态平衡新机制的选择(这里的选择有两种含义,一是指迅速建立起新缓冲机制的系统的竞争成功,二是为个体和群体提供融入该系统形成中去的积极性)。从中石器时代或古代遗址开始的考古记录中,就能分辨出大量与集中权力演化有关的缓冲方式。

对该问题最明显也是最早的一种反应是储藏系统的发展,以消除资源生产时间上的不规则。在希弗尚未发表研究中所引用的希尔和迪安的观点,指出(在一定条件下)在维生生产的随机变化和增加的储藏量之间存在相伴关系。在早期农业、特别是那些收获谷物的人群中,确凿的储存系统有很多介绍,但值得指出的是,这种设施也存在于前农业时代晚期许多半定居或定居的背景中。正如厄尔和达特洛伊所说,这种储藏及其缓冲功能,能够为合作活动提供资助,在复杂结构的演化中发挥作用。他们指出,第二种功能的迅速增长,是政治演化较晚阶段的特征。

同样,区域间贸易既表现为人口应对局部生态系统事件不可预测的一种重要缓冲,也常与集权政府的演化有关。哈德斯蒂所引用的研究表明,在某些区域贸易网的范围和局部灾难性自然事件的发生频率之间存在相伴关系。因此值得指出的是,区域贸易网开始在各地区考古记录中出现的时间,正是普遍出现定居的时候。在回顾有关贸易网的考古文献的时候,韦布注意到,在旧石器时代之前,有关交换的证据很少(输入的东西通常很少,而且是出

自很近的地方,因此很难断定是外来的,更不用说存在什么贸易网了)。他认为,物质正式的长途移动正好出现在新、旧大陆各地确立起稳定的新石器时代经济之前(尽管它们存在于人口稠密的狩猎采集者中,例如北美西北海岸的史前期,这与农业本身刺激了这种形态的看法相左)。正如韦布进而所见,区域间交换经济的发展,是世界许多最初原始文明“形成”阶段的普遍特征。

当然,有些出现对贸易需求的原因只是由于一些定居群体受到其它声称领地所有权定居群体的包围,从而难以像流动人群那样直接得到某些资源,特别是原料。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早期贸易的对象很多是奢侈品(如矿物、羽毛、贝壳),以前并不存在对这些东西的需求。另外还有一些物品如黑曜石,其实用价值看来也不足以说明它广泛分布的理由。许多学者主张,这些奢侈品贸易主要发挥着一种类似马林诺夫斯基描述的流行在特洛布里安岛岛民(Trobriand Islanders)中的“库拉圈”功能,建立联盟及畅通的渠道,以便在必要的情况下进行维生资源的紧急贸易(因为紧急物品零散的流动不可能在考古学上辨认出来,其双重功能在史前期很难得到证明)。

怀特和齐德认为,这些奢侈品的作用还包括创造一种无限的需求,有助于刺激必需品连续不断的生产和经常性流动,对必需品的需求较为有限且不经常,并不总是与对其它实用品或物质的互惠需求相吻合。韦布断言,宗教和市政纪念性建筑以及礼仪活动的增加,可以部分从正是为了创造这种无限需求的手段来解释,由此能够保证实用品的持续流动(保障维生资源的紧急贸易渠道畅通无阻)。正如很多人所言,比其它任何日用品创造出真正更为无限的需求的奢侈品本身在刺激交换方面,以及在作为交换物品的“真正”价值短期和长期不对等的一种调节器方面,都发挥了作用。重要的是,由于奢侈品有助于促进中心人物的形成,使得头人的角色转变为首领,因此很可能会增值,至少在贸易极度失衡或不规则的情况下会如此。

最后,为了应对物品和维生资源时空分布不平衡而组织起来的再分配交换系统,很多学者都把它作为集权政府出现的一种因素。特别是塞维斯提出,政府的产生主要是由于人们自愿加入集中政治系统的结果,其主要功能是集中的经济再分配。他



清晰地阐述了酋邦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产生,其功能就在于发挥了集中再分配的作用,以平衡一个异质性环境中各部分产品的分配——这就产生和维持了经济上的共生关系。塞维斯的结论受到其他学者的批评和修正。桑德斯和韦伯斯特质疑,在集权政府演化的过程中,环境异质性和再分配功能是否像塞维斯所说的那样具有普遍的重要性。在他们的一些研究案例中,如奥尔梅克酋邦,在等级结构的选择中,竞争要比再分配更为重要。同样,厄尔在讨论夏威夷酋邦时谈到,该层次的社会政治单位并非完全像塞维斯设想的那样贯穿于各异质性环境,而再分配很可能更多用以支持政治上层建筑自身的运转,而非缓和人口压力。不管怎样,了解局部的环境风险和集中权力在提供经济保障上的作用,在两种讨论中都有体现。例如厄尔注意到,夏威夷的灌溉系统易受到洪水和海潮的破坏,当地人群的适应能力不足以应付突发事件带来的危险,结果必须用某种跨区域交换系统来缓冲。即使厄尔是正确的,即夏威夷的再分配系统的作用更多地是为了支持政治等级而不是缓解人们的风险,但看来很有可能的是,人们之所以愿意加入系统,至少是出于他们对风险的认识,从而愿意以重税的代价来接受一种平衡保护伞的规则。

无论如何,塞维斯的模式——或者至少假设以再分配来减少风险和异质性是集中等级制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相当可信的。如果我们回顾一些个案研究并回到更一般性的问题上来——为什么许多独立的人群在经历了千万年的平等结构之后,几乎同时开始将自己按等级制组织起来?无论夏威夷和奥尔梅克的个案多么特殊,似乎确实存在这种普遍的现象,这要求我们认识引起演变的某种共同诱因,它很可能在各种环境中发挥作用,但仅十分简单。我觉得,伴随着拥挤和定居而来的风险加大和原有缓冲机制的丧失,才是共同的诱因,而再分配只不过是一种相同的对策而已。

### 解释另类途径

如果一种世界性向集中等级政府方向发展趋势的普遍现象可作如是解释,那么仍有一个问题需要回答——如果有此普遍诱因,那么为什么有些人走向了早期或原始国家,而另一些却没有?另一相关问题是,是否可以通过纯粹的比较分析而不是纯历史学分析来解决——诸多国家是否都是同一

过程的结果,还是需要个别描述和解释的副现象?我提出两条不同的路径:(1)把国家看作是特定环境中政治演化的一种合乎情理的产物;(2)把国家看作是一种副现象,是集中制一般性选择的随机结果。

### 解释原始国家的特殊演化

假设一:国家是特殊环境的一种功能

前面所述的一般性模式认为,我们至少有一个方向可以探寻国家形成的规律。如果环境波动所增强的脆弱性是政治演化的一个主要诱因,我们可以设想,集中化进程在以下地区会走得最远:(1)脆弱性最明显的地区;(2)人口大量聚集的地区(因为存在一个广泛共识,就是不管怎样,国家具备组织较多人口的机制);然而,人口一旦聚集,就会超出一般需求,在更大范围内建立环境缓冲系统;(3)人口受到严重“限制”的地区,相对来说没有什么潜力可以作卡内罗所说的空间调整;(4)自然环境波动剧烈而频繁、适于产生政治反应的地区(例如,既不简单遏制人口的增加,也不经常消除准备应对危机的积极性);(5)环境差异足够大且能互补的地区,在一个很大的地理区域内,合并在一个统一集中政治系统之下,在交流方便的范围内既可行又有好处。对这些因素进行量化是一个经验性问题,目前还很难加以分析。

现在已经有一些尝试将这样的观点应用到新大陆两个早期国家形成的中心(秘鲁和中美洲)的研究,尽管只是取得了部分的成功。近来,伊斯贝尔明确提出,秘鲁的早期国家是一种适于在安第斯山区运转的“能量均衡”系统,因为当地环境的海拔和纬度变化很大,各个受到严重限制的区域应对气候波动十分脆弱。

在一项较细致的分析中,桑德斯和韦伯斯特特别参照了一些设定条件的变化,试图建立一个中美洲复杂社会多线演进的模式。还有弗兰纳利的观点,他认为国家形成过程中的规律性源自社会政治系统演化的普遍进程和动力机制。他们认为演化的不同往往是由于自然环境的不同所造成。他们提出,有可能存在几种演化路径,其中一些向国家趋同演进,但另外一些则发展到酋邦嘎然而止(与塞维斯的观点相反,这些学者把酋邦视为一种不同适应方式而不是国家形成的一个发展阶段)。他们认为,这些路径主要受自然环境三种差异的支配:环

境内在的风险度；一个地区的多样性和异质性；一类环境的大小和产量（这些主要变量或多或少已经被考虑过了）。在他们的模式中，高风险和高度多样性与原始国家的形成相伴。

但是，如我提出或像伊斯贝尔以及桑德斯和韦伯斯特试图做的那样，把这些变量作为国家形成的决定因素是有问题的。首先，如果说这种复杂性和风险观点适用于新大陆两个早期国家形成中心的话，却很难说它适用于旧大陆的其它文明中心。塞维斯已经指出，与新大陆的情况相比，至少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核心地区具有很强的同质性。他还提到，埃及环境的同一性和可预测性与尼罗河泛滥规律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也许可以建立一种适用于埃及的与风险相关的观点，注意开拓区域之间极其分明的界限——这是“限制”的一个明确例证——将其与尼罗河年度泛滥的变化和规模结合起来。这种不确定性很可能在需要用灌溉系统来解决问题之前，就已经需要有一种储存和再分配系统。但是，这个问题还有待讨论。

但是，所有以环境来解释向国家演进的其它路径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贝蒂·梅格斯对南美文化演化“环境潜力”及其影响的描述就受到了批评，因为她没有独立于史前文明的产生与否之外，来对环境问题提供一个客观的评估。对卡内罗“限制”论的评价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因为在早期文明的发祥地找到限制条件是一回事，而通过客观评估限制条件，令人信服地证明在早期国家出现的地方比没出现的地方更显著，显然是另外一回事。同样，伊斯贝尔关于环境风险和复杂性的讨论就像桑德斯和韦伯斯特以及我的观点一样存在缺点，我们都没有对这些变量进行单独评估。桑德斯和韦伯斯特以区域降雨量、霜冻周期和农业病虫害的形式提出了特定标准，这与其它讨论相比较符合独立衡量的要求，但是他们的标准仅适用于中美洲。既没有证据证明这些特征能够将中美洲与其它未产生早期国家的地区区分开来，也没有足够多的案例可以和中美洲每个不同发展路径建立起联系，更不要说与他们所讨论的那些变量之间有因果关系了。R. 科恩很好地总结了此一问题，他指出，尽管近来对风

险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讨论，但是还没有这样的研究，采用特定和压力的量化指标，对存在及不存在经常性食物短缺地区的早期国家（以及非国家）进行真正细致的分析。

总之，应用环境和生态原则来解释国家的特殊演化，相对于非国家相比，还很不清楚，虽然似乎有充分的理由表明，在集权政府较为普遍出现之下存在一批共同的适应问题。

#### 假设二：作为副现象的国家

作为另外一个假设，我认为早期国家——至少是原始国家——可能最初是一种副现象，只能是从历史学分析层面上解释的、一种倾向于集中的较为一般性选择压力的特殊结果。简言之，最早国家的分布可能反应了演化的随机创造过程，而非较具系统性的选择过程，国家作为一种政治形式的效果只见于传播，而难见于起源。或许正因为如此，之前试图构建通则的尝试，因为皆关注最早国家本身，而非关注趋于集中的普遍趋势，结果令人沮丧。

如果我们考虑演化创造力的随机性，留意国家形成相关变量的复杂性，注意许多学者在描述原始国家演化共同因素乃至在定义这些国家时所遇到的困难，如果接受 R. 科恩把国家看作是一种趋同演化范畴的定义；特别是接受他和韦伯斯特的观点，认为国家在许多负面理由上与酋邦有别（通过分裂来防止瓦解的自然倾向）；那么似乎就很有可能的是，早期国家的确是一种副现象，其特殊演化（与酋邦的普遍演化和后来国家作为一种适应类型的传播有别）的确不适于做系统性分析，除非采取一种高度特殊的方式。

该问题明显属于一种经验性问题。对“另类路径”的进一步探索，不应着眼于事件实际序列具体而详细的共性，而是应该关注所讨论类型的共同选择过程所促成的较为一般的共性上。考虑到个别活动和环境事件的复杂性，比较分析难以找到细节上的相似性并不令人惊讶。怀特和约翰逊的结论——在时间特定点位上的某些考古序列中缺乏某些关键要素——不应该妨碍我们去寻找较一般的共同要素，正是它们以各种方式和合力在早期国家的平行演化中发挥了作用。





## 本期导读

### 一. 《新大陆国家形成的生态学基础：一般和局部模型的构建》

1965年丹麦经济学家埃斯特·博塞罗普出版了《农业起源的条件》一书,对马尔萨斯经典的人口/资源平衡理论进行了修正,认为人口的增长和资源的短缺会刺激人类在经济上作出变革。她认为栽培和强化农业是社会面对人口压力所促成的进步。博塞罗普的理论受到了学界的极大关注。本文作者马克·科恩于1977年出版了《史前期的粮食危机》一书,对博塞罗普的理论作了全面的论证和阐述,并首创骨骼古病理学和营养分析的方法来检验农业起源前存在人口压力的假设,最终使古病理学研究成为当代考古学一个前沿探索领域。人口压力理论也激励了卡内罗等学者提出冲突论来解释国家起源的动力机制,并使科恩将其延伸到国家起源动因的阐释上。科恩认为,更新世末和全新世初的人口压力和野生资源短缺,迫使人类社会发展出农业来应对粮食危机,而随后发生的早期国家和集权政府起源也是同一过程的合理结果。当农业人口增长接近土地载能的时候,人类社会就发展出国家机构来应付这种危机。虽然文章从生态学基础来讨论早期国家的起源,但是并没有落入一种环境决定论的窠臼。由于国家起源的一个最基本条件是大量的人口聚集,因此促使人口聚集的生态环境条件是必须考虑的先决条件。科恩在文章中提出,既要肯定国家起源动因应该有通则性的认识,但是也需要对局部状况作具体的分析。因为世界上几大文明中心的环境差异很大,因此这些早期国家的诞生很可能是不同区域中的社会在应对特定环境条件时所做的相似反应,从而表现为具体过程差异较大,但在集权政府形成上有一种趋同的发展趋势。因此,对早期国家起源的通则性认识和具体个案的特殊性分析都不可偏废。

(陈淳)

### 二. 《华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至商代的植物和人类》

“中澳联合考古队在伊洛河流域的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在26个遗址发现炭化植物遗存,年代从公元前6千纪至前1300年(树轮校正年代)。这些植物遗存记录了华北地区作物、野草和其他植物的漫长历史,它也证明作为考古调查一部分的土样采集和浮选的成效。作物遗存的10个加速器质谱测年(AMS)数据有助于对该地区农业发展历史的评估。粟(*Setaria italica* subsp. *italica*)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即已种植,在随后的至少四千年里是主要的栽培作物。黍(*Panicum milliaceum*)的重要性则一直不很显著。水稻(*Oryza sativa*)在公元前3000年(校正年代)左右出现,但它显然不是一种重要的本地作物。小麦在公元前1600~1300年(校正年代)间日益成为举足轻重的栽培作物。草随时代变化,多一年生草类,某些草类可能是家养动物的饲料。以粟、小麦和豆类等旱地作物种植为主,辅以少数水稻栽培的华北农业传统,因此至少可以上溯到公元前1600-1300年前的早商时代。”上面的话,原是这篇文章的内容提要,它把文章的主要内容及其方法论意义都说明白了,我把它抄写在这里,以为读者导引。

(陈星灿)